

场景催生智能经济时代新动能

尹西明

当前，大模型、具身智能、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正在加速突破，不仅为千行百业推进转型升级提供新引擎，更为千家万户创造美好生活带来了无限可能。那么，如何让这些智能“黑科技”走出实验室，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新动能，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答案就藏在“场景”二字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质取胜和发挥规模效应相统一，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丰富应用场景，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和领先技术，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开放应用场景，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十五五”规划纲要亦提出要加快构建应用场景和生态体系，培育更多支柱性先导性产业，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这一系列部署，为“十五五”时期我国智能经济发展指明了路径。

场景连接技术与市场

“场景”一词源于文学艺术，如今被赋予了全新内涵。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场景是指用于系统性验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制度政策的具体情境。

通俗讲，场景就是新技术找到“用武之地”的那个具体场域。它既可以是工厂里一条需要智能质检的生产线，也可以是城市里一个需要精准调度红绿灯的交通路口，甚至可以是家庭里一个能听懂方言的智能音箱，或者一句话就能帮你自动规划旅游行程并订票的AI手机助手。

与工业时代的技术应用有着本质区别，智能经济时代的场景正在驱动科技一

产业发展范式的跃迁。传统技术应用是“技术找场景”，先有技术成果再寻找落地空间，始终处于被动适配的地位；而智能经济时代则是“场景定义技术”，以真实场景需求反向牵引科学问题凝练、技术研发、产品迭代与产业培育，场景成为驱动高质量科技创新和高效率成果转化的关键力量。

理解场景的重要性，需把握四重逻辑。从技术演进逻辑看，人工智能正在“能说会道”的“技术爆发期”迈向“进场干事”的“价值创造期”。大模型已具备理解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智能体则更进一步实现了从“理解”到“行动”的跨越。但技术再先进，也需要在真实环境中反复“磨炼”。通用大模型只是基础，只有在制造、医疗、金融等海量垂直场景中完成微调优化，才能真正创造产业价值；脑机接口技术的突破，也高度依赖临床康复、神经疾病诊疗等场景的真实数据积累。

从经济发展逻辑看，场景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的重要枢纽。市场规模优势不会自动转化为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场景正是实现这一转化的关键桥梁。新场景直接创造新消费、催生新投资，成为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的“连接器”和民生改善的“连心桥”。一台能扫拖一体、自动换水的智能机器人，背后是智能传感、路径规划、人机交互等多个技术领域集成应用，拉动的是整条产业链，乃至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开发智慧养老、智慧医疗等消费新场景，能加快智能机器人、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应用，培育消费新增长点，驱动智能向善。

从国际竞争逻辑看，场景成为大国科技博弈的战略新高地。AI领域的竞争焦点

已从底层技术研发延伸到场景主导权、生态控制权和标准制定权。谁掌握了大规模、高价值、战略性的应用场景，谁就能抢占技术迭代的先机，掌握新产业新赛道的主导权。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丰富的经济社会应用场景，这是我国发展智能经济的独特优势。从构建具身智能训练场的体系布局，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场景开放，再到打造海陆空全无人体系应用场景，我国正在用场景定义技术方向，争夺全球“未来技术定义权”。

从改革创新的逻辑来看，场景是制度创新的“试验田”。未来产业培育和颠覆性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往往超前于现有监管规则、行业标准与制度体系。场景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小范围、低成本、可控制的验证空间，系统性检验技术在实际环境中的效果，以及商业模式、制度政策是否配套。通过先行先试实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向适配，能够有效破解智能驾驶、脑机接口、未来能源等领域的“制度滞后”难题。可以说，场景成为智能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的新型试验场、未来产业抢占发展新高地的“加速器”。

把场景优势转为发展胜势

近年来，我国已形成“国家顶层设计、地方特色探索、企业主体发力”的场景实践格局，场景培育正从零散试点走向系统推进，成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发展智能经济的重要抓手。然而，这仍远远不够。“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智能经济形成核心竞争力、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的关键窗口期，需要切实用好场景驱动创新，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人工智能+”行动走深走实。

沂蒙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意蕴

郑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沂蒙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是沂蒙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创造的宝贵财富，承载着“党群同心、军民情深、生死与共、水乳交融”的深厚情感，不仅是历史的丰碑，更是激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落地生根的鲜活载体。沂蒙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承载不同时代使命，但在价值内核上高度契合。这种契合基于二者共同的政治立场、文化底蕴与道德追求，彰显了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至上、追求人类解放事业的生动体现。

一、价值立场：坚守人民至上，践行群众路线

人民至上是二者共同的价值立场，始

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实践要求。“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内核，始终围绕“人民”二字展开。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之所以能做到“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一个儿子送战场”，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给予人民实实在在的权益。这种血肉联系，正是“民主”“和谐”价值理念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体现，证明了唯有坚守人民至上，才能赢得拥护、实现国家富强文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将人民幸福安康作为价值追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倡导，旨在保障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取向，致力于构建公平正义环境，维护人民合法权益；公民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准则，引导公民践行道德规范、营造和谐相处氛围。三个层面始终围绕“以人民为中心”，与沂蒙精神的价值

立场高度契合，都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二、精神内核：蕴含爱国奉献，彰显奋斗担当

爱国奉献、奋斗担当是二者共同的精神内核，蕴含着对国家民族的赤诚热爱，彰显着不畏艰难、实干奋进的特质。爱国奉献是沂蒙精神最鲜明的标识，革命战争年代，“红嫂”明德英用乳汁救伤员、文前模范王克昌千里支前、沂蒙六姐妹倾力支前，用行动谱写了爱国奉献的壮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沂蒙人民接续奋斗，形成厉家寨精神，将临沂打造成全国知名商贸物流城；进入新时代，沂蒙精神转化为老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层面将“爱国”置于首位，明确爱国奉献是公民基本道德要求，倡导公民维护国家利益、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敬业、诚信、友善”职业上是奉献精神，是对职业的奉献，诚信是对社会的奉献，友善是对他人的奉献。同时，其蕴含的奋斗精神与沂蒙精神“吃苦耐劳、开拓奋进”高度契合，无论是革命年代浴血奋战，还是新时

代攻坚克难，二者都强调以实干担当应对挑战，彰显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品格。

三、实践导向：强调知行合一，服务发展大局

知行合一二者共同的实践导向，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注重将精神内涵转化为实际行动，服务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大局。沂蒙精神源于实践、指导实践，革命年代引领浴血奋战，建设时期支撑战天斗地，改革阶段推动开拓创新，新时代更指引山东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新旧动能转换、现代化强省建设中勇担使命，其生命力在于始终与实践紧密结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强调知行合一，培育过程既需理论宣传引导，更需实践养成，让价值理念转化为日常行为准则。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需全体人民实干实现，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需全社会共同践行，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需每个公民自觉遵守。这种“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践行理论”的导向，与沂蒙精神高度一致，彰显了二者服务发展大局、推动社会进步的共同追求。

（作者单位：中共临沂市委党校）

“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七个着力”要求中的重要内容。如何让历史文脉重焕荣光，是人文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也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六增”要求的具体实践。日照是东夷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实现东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壮大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文化与经济相互支持、共同繁荣的重要着力点。

要坚持因地制宜和因势利导并行。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原则，体现了我们党从认识规律到运用规律的转化。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关键是要紧密结合自身实际，尊重差异、尊重规律，创造性开展工作。要因地制宜赓续东夷文脉，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开展考古发掘、文物研究和科学阐释，加强对东夷文化资源禀赋的梳理和挖掘，系统阐释东夷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要因势利导推动文化“两创”，深入推进以文润城、以文兴城，传播更多承载东夷文化、民族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拓展东夷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要坚持项目带动和品牌带动并抓。当今时代，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与经济融合的产物，正在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最为根本、最难取代的竞争优势。要实施“重大项目”和“知名品牌”双轮驱动战略，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原则，推动东夷文化资源和要素向优势领域、优秀企业、优质项目集聚，实现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持续深化东夷文化研究成果交流互鉴等品牌活动，推出一批东夷文化传承的标志成果，进一步擦亮城市的文化标识，带动“鲁东南文明之光”底色越来越亮、成色越来越足。

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并重。文化的生命力在民间，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人作为文化建设的核心，深刻指出“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在人文经济学视角下统筹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需要我们用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衡量工作成效，深化以文化人、以人促经、以经育文的探索与实践，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让更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以城市文明建设和文明乡风建设的丰硕成果，实现人的需求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的跃迁。

要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以“五个必须”概括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认识和体会。“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一方面，要抓好《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关于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高质量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意见》等政策落实，强化政策集成效应。同时，围绕落实国家、省市“十五五”发展规划，及时谋划制定特色鲜明、切实可行的东夷文化“两创”中长期规划，拿出时间表、路线图，项目化推进东夷文化“两创”工作。

【本文系2025年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课题“人文与经济的双驱——新时代文化经济功能研究”（2025XTN13）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中共日照市委党校】

推动新就业群体与基层治理双向奔赴

魏洪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加强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当前，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壮大、触角广泛延伸，已成为服务群众生活、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坚持以基层党建为统领，推动新就业群体深度融入基层治理体系，是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激发社会治理活力的重要举措，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强化组织引领，筑牢党建覆盖根基。针对新就业群体流动分散、行业分布广、组织化程度低的特点，健全条块结合、上下联动的党建工作体系，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向新业态、新岗位全面覆盖。依托行业主管部门与属地党组织，常态化开展新就业群体党员摸排、登记、管理工作，灵活采取单独建、联合建、挂靠建等方式组建基层党组织，消除党建覆盖空白点。依托线上党建平台开展常态化党员教育管理，强化党员宗旨意识与先锋模范作用，以党组织凝聚力引领新就业群体向心力，为其参与基层治理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优化服务保障，凝聚群体参与合力。坚持以服务聚人心、以保障促融入，整合党群服务中心、户外服务站等资源，搭建多层次、广覆盖的服务阵地，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息补给、应急救助、技能培训、法律援助等精准服务。联动政法、人社、行业监管等部门，建立健全权益保障、纠纷快速处置机制，妥善解决劳动争议、服务投诉、安全保障等实际问题，切实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推动治理理念从管理管控向服务凝聚转变，打破治理主体与参与群体的隔阂，构建平等协作、互惠互动的治理伙伴关系。

健全机制赋能，激活治理参与动能。搭建数字化治理平台，畅通问题上报、诉求反馈、服务对接渠道，引导新就业群体发挥全城流动、触达末梢的职业优势，主动上报安全隐患、矛盾纠纷、公共设施损坏等治理线索，形成发现—上报—处置—反馈的工作闭环。建立积分激励、荣誉表彰、正向宣传等机制，将参与治理、志愿服务等行为与激励保障挂钩，持续激发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新就业群体当好基层治理“流动哨兵”、政策宣传“移动喇叭”，助力风险防范、矛盾化解、政策落地。

提升治理效能，构建协同共治格局。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推动基层治理从单一行政主导多元协同共治转型，治理链条向扁平化高效延伸，治理响应向精准化动态升级，有效补齐基层末梢治理短板。要持续深化基层党建引领作用，不断完善组织覆盖体系、优化服务保障供给、创新激励约束机制、拓展治理参与场景，推动新就业群体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为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社会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单位：中共曲阜市委党校）

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逻辑

高云

劳动教育的价值不止于劳动技能的习得，更在于引导受教育者经由劳动实践活动确证自身的主体地位。所谓“主体确证”，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中一个核心命题——人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于劳动对象，并在这一对象化过程中直观自身、认识自身、肯定自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劳动可以树德、可以增智、可以强体、可以育美”，其深层含义正是指向劳动对人之主体性的全面塑造。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不只是为了让学生掌握某种生活技能，更是为了引导学生在亲身劳动中理解世界、认识社会、确证自我，形成尊重劳动、崇尚创造、勇于担当的价值品质。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劳动形态。算法生成、自动控制、智能制造、无人作业等技术不断拓展机器替代人的边界。“劳动教育还有没有必要”的追问将我们推回一个根本问题：劳动对于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机器可以替代部分重复性、程序化、可计算的劳动环节，却不能替代人在劳动中形成的目的意识、责任意识、创造意识和价值判断。劳动教育所要守护的，正是智能时代不可被技术替代的人的主体性。

一、劳动的本体论意义：主体确证何以不可替代

马克思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界定为人的类特性。这一命题中真正要紧的，不是“活动”这个词，而是“自由”与“有意识”这两个限定。人在劳动中先

于行动设定目的，在多种可能中择取手段，在完成的作品中发现自身的意志与能力——整个过程就是把内在构想转化为外在事实。确证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劳动者在产品中“看见”了自己。这不是纯粹的心理体验，而是在物质世界中展开的存在论事件。由此看，劳动教育从来不是简单地让学生“会干活”，而是通过真实劳动过程，使学生理解劳动创造价值的实践逻辑，体会个体与他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现实联系。

人工智能能够替代的，说到底是在劳动过程中那些可编码、可计算、可标准化的操作环节。至于目的由谁设定、价值由谁判断、意义由谁赋予，这些在逻辑上先于任何操作指令的事情，并不落在算法的能力边界之内。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可以提升效率、优化流程、减少重复性劳动，但不能替代人对劳动目的的把握，不能替代人对劳动过程的体验，也不能替代人在劳动中形成的责任感、创造力和社会意识。正因如此，技术替代非但没有取消劳动教育的理由，反而从反面把它的哲学根基暴露得更加清晰——劳动教育所要培育的，恰恰是人作为目的设定者和价值判断者的那种主体能力，劳动教育的深层价值，正在于使学生在身体力行中确证自身作为创造性主体的存在。

二、技术遮蔽与新形态异化：劳动教育的当代紧迫性

智能技术在带来效率的同时，也制造了一种独特的认知遮蔽。当“一键生成”“自动完成”成为青年一代习以为常的日常经验，劳动过程中原本不可省略的构思、试错、协作与坚持就被悄然抹去，人很容易滑向“价值由技术自行产出”的错觉。这种状况在理论上构成了一种新形态的异化。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异化劳动的四重结构，人同劳动产品、劳动过程、自身类本质以及他人的异化。智能时代并未消除这四重异化，而是赋予了它全新面孔。青年一代越来越频繁地面对“一键生成”“自动完成”“智能推荐”等技术情境；在人工智能环境中，劳动者不是在智能流水线上失去对产品支配权，而是在技术黑箱中失去对创造过程的理解力；不是因为劳动强度过大而感到痛苦，而是因为实践经验日趋空洞而无从体认劳动的内在价值。一旦人不再亲手接触材料、亲身克服阻力、亲自承担后果，那么“我能创造”这个信念就会因为缺少经验喂养而逐渐干瘪。由此而言，劳动教育在当下的紧迫性就在于：它为个体确证保留了一块不可被技术代行的实践场域。

三、真实劳动与技术赋能的辩证统一

强调劳动教育的实践本位，并不意味着排斥智能技术。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统筹为一体战略布局，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综合素质的要求更高。劳动教育需要在守住实践根基的同时，合理借助智能技术，提升劳动教育

